

January 1934

容純甫的中國西化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容純甫的中國西化觀。《嶺南學報》，3(3)，139-15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1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三編

第九章

容純甫的中國西化觀

七十年前的中國雖然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整的沒有西化的中國，但是七十年前的中國却已有了一個整的受過而積極主張澈底西化的中國人；這位中國人並非別人，就是本章所要介紹的容闕(純甫)先生。

二十年前當這位容先生逝世時，上海的人士，曾爲他開過追悼會；誄詞輓聯之歌頌讚美他的，雖是應有盡有，可是二十年來——也許是七十年來的中國人，好像是沒有給他相當的位置，而對他沒有相當的認識。我們談到近代革命運動，我們總會記起孫中山以至洪秀全；我們說到維新運動，我們總會記起康有爲以及梁任公；我們講及洋務，我們總會記起曾國藩李鴻章以至薛福成郭嵩燾；我們想及教育，我們總會記起張之洞張百熙。然而這位無論在革命運動，維新運動，而猶其是在洋務在教育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的容純甫先生，好像是沒有相當的被認識，而且逐漸的被忘記了。

他之所以被人忘記，他之所以少人認識，照我看起來，大約是由於他的行爲和思想太過超越了他自己的時代；質言之，就是因爲他太過西化了。在舉國若夢而不知西化爲何物的時代，當然是沒有人去理會和記憶他。但是在像現在一樣的西化逐漸爲人們所認識而積極被人

提倡的時代，這位最先受過而積極的主張澈底西化的容先生，是格外值得我們的介紹和認識的，而且應該為我們所介紹和認識的。

事實上我以為七十年前，也許是三十年前，只有這位容先生是真能知道中國的根本病源和根本的需要的人。同時只有這位容先生是認真努力於掃除這個根本病源和提倡這個根本需要的人。但是要想明白他之所以能夠有了這種認識，這種努力，我們應當明白他個人的環境特性，以及他的教育的機會的情況。

讀過歷史的人，總能覺到自十九世紀而猶其是十九世紀之下半葉到二十世紀，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段；而這個時期也是中國五千餘年的歷史上最為重要之一章。容氏生於十九世紀之初葉，（一八二八）而死於二十世紀之初葉。（一九一二）他既親眼和澈底的觀察過半世紀多的中國的變化，他又親眼和澈底的觀察過半世紀多的世界的變化，他赴美國求學以至奉命赴歐美購辦機器的時候，還是乘着賴風行駛的帆船。但是他在臨終之前，已有了凌空行駛的飛船；他在出世的時候，還是國人享着乾隆皇帝的盛世的餘澤，但是他在臨終的時候，中國已經過鴉片戰爭，英法入京，中日戰爭，八國聯軍，而至滿清推倒的中國。簡單來說，他是近代中西文化接觸所產生出的人物，他不但是個最先受過西洋文化的洗禮的人，而且是一個最先主張中國應該澈底西化的人。

容氏生於澳門附近的南屏鎮，在他少年的時候，香港還未割讓，廣州雖時時有洋人來往，然西洋人在中國的大本營還是澳門半島。澳門之為葡人佔據，是在容氏生前二百七十年，從時間上看去，二百七十年雖是很長，然而洋人之在澳門的目的，大要不外是交易互市；交易互市固引起宗教上的天主教之傳入而生出科學上的介紹，但是利瑪竇們的主要目的，是專為傳教而來，而且他們一方面為要利用政治的

勢力去宣傳宗教，其結果是宗教的宣傳有時受了政治的打擊，一方面因為在一個歷史最久，守舊最深的中國統治之下的環境裡，來求中國人的西洋宗教化，結果是只有淺薄皮毛而沒有澈底的同化。總而言之，中國人這二百餘年來——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初葉——之效法西洋的宗教，或是科學，大約是由於一時權宜的被動的地位，而非主動的地位。

自瑪禮遜來華宣傳新教以後，中國人之信仰基督教，逐漸成為主動的地位；其原因是由於傳教的教士寄宣傳宗教於教育之中，於是教育不但成為宣傳宗教的工具，而且逐漸成為改革政治社會的利器，容先生就是這種教育所產生出的人物。據他的自傳裡說：（中譯西學東漸記）他方七歲，（一八三五）他的父親就送他入了倫敦婦女會在澳門初設立的學校念書。澳門既在西洋人統治之下，則西洋文化之影響於這位頭腦清白，意志未定的少年，已是一件有可能性的事；何況他又曾在西洋人統治的澳門之下的西洋人所設立的學校裡肄業。

從七歲到十七（一八四五）歲，除了一個很短的時間，因為學校停辦而家居外，他日常所受教的都是西洋人物，所接觸的是西洋環境。鴉片戰後，香港割讓於英，（一八四二）容氏在澳門所肄業的學校，也於一八四五年遷移香港。澳門屬葡，香港屬英，而學校之主持教育者却為美人。所以這位年紀十七歲的容氏，老早已溶化於英美葡諸國的文化設施和統治之下。

到了一八四六年，（十八歲）他因了校長之助，得以赴美留學，同行者雖有數人，（黃勝黃寬）然此時中國人之留美求學者，僅此三人。他所處之環境，所受之教育，乃是純粹的西洋環境和教育，而且這次留美，有了八年之久，（一八四六——一八五四）那麼美國文化之影響於他的深切，可想而知了。

就是返國以後，他無論是在政府或是在商界所與共事的人們和環境，還是直接或間接和西洋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九年以後（一八六三）因得曾國藩的認識，初而赴歐赴美購辦機器，後來帶領留美學生（一八七二）重旅美國。事實上他此後在美的時日，還比他在中國為多，而且因為他的夫人是美國人，家庭妻兒均在美國，所以他一生所處的環境，差不多可以說是西洋文化之下的環境。

他既有了這種環境，他又具了一種獨立不拔的特性。他本來是一個家境困難的農家子，所以貧困是他所嘗過的，貧困決不能變換他的志向。他雖然是得了翁士教會的幫助，而始能在澳門在香港在美國求學，然他却因此而不俯首貼耳的受着教會的指揮和引誘。他在自傳裡告訴我們，在美國中學畢業之後，本來可以得教會的津貼而升入大學，然因為教會要他畢業以後，充當教士，從事傳道，所以他寧願自甘貧苦，而求他個人的出路。他之所以能夠在大學裡畢業，正是由他這種堅忍不拔的意志而來，而他之所以成為後來的他，也是由他這種堅忍不拔的意志而來。

返國以後，東奔西走，忽南忽北，一再失業，雖有好的薪俸而不願俯就，始而在粵當美國公使的書記，再而就香港律師的聘，再而在滬當海關翻譯，又再而為英商公司書記及絲商茶商買辦。這些事業既非他個人的素願，轉就轉棄，他總視做等閒，太平天國的當道曾給他以官爵，然而無功之賞，是他所不願受的。直到他見用於曾國藩，他的事業始見固定，而他在現代化的中國的位置上的重要，也就開始。

總而言之，容氏是最富於獨立堅忍性的人，他自傳裡說：

「數日後，諸校董忽召予往而議資遣入學事……校董之言正與勃朗海門同，謂畢業後歸國傳教則可，第具一志願書存查耳。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對予極抱熱情，而予之對於此等條件，則不能

輕諾。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爲之。縱政府不錄用，不必遂大有爲，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竟吾素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况志願書一經簽字，即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爲中國謀福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

又如他說：

「總稅務司告予曰：凡中國人爲譯者，無論何人，絕不能有此希望。(升總稅務司)予聞言退出，立作一辭職書投之。書謂予與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國人而爲中國服務，奈何獨不能與彼英人享同等之權，而終不可以爲總稅務司耶？予書入後，總稅務司來君初不允予請，面加慰留，令勿去職，且誤會予之此舉，爲嫌俸薄，故以辭職相要挾，因許月增予俸至二百兩。噫！彼固以爲中國人，殆無一不以金錢爲生命者，寧知衆人皆醉之中，猶有能以廉隅自守，視道德爲重，金錢爲輕者耶？且予之爲此，別有高尙志趣，並不以得升總稅務司爲目的。予意凡欲見重於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關中通事及其餘司一職者，幾無一不受賄賂，以予獨處此濁流中，決不能實行予志，此辭職之本意也。」

因爲他個人有了這些特性，教育和環境，所以他後來對於中國改造上，都有了特別和超越的抱負和努力。我們現在且來談談他對於改造中國的計畫和成就。

容氏回國後之第六年，(一八六〇)曾和美國教士及一位中國朋友作金陵之遊。這次遊歷的動機，本爲探知太平天國的組織和政策的內容。可是事有巧湊，到了南京却遇着數年以前，曾在香港認識而當時已居高位的干王。干王因爲他是故人而且知他遊學外國，見聞較廣，

故詢他對於太平天國的建設問題。據他自傳說，他曾條陳七事，今且列之於下。

- (一)依正當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
- (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的軍官。
- (三)建設海軍學校。
- (四)建設善良政府，聘請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
- (五)創立銀行制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
- (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為主課。
- (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

這七件條陳，本來是針對太平天國當時的需要而說，他自傳裏說，這是這次從蘇州至金陵途次有所感觸的結果，並非預先有過詳細考慮而出此。然而事實上，此後七十年的中國所急急以圖者，還不出此範圍，而他此後五十年所努力以求實現者，也沒有多大的變更。第一條所謂依正當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是由他當日見到太平天國的軍隊，是由烏合之衆而成的，紀律既乏，組織制度更談不到。第六條下半段以耶穌教聖經為主課，明明是因太平天國之揭竿起事，是以基督教來號召；除了這條以外，所謂武備學校，海軍學校，聘請顧問，建設良善政府，創立銀行，訂度量衡，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及實業學校種種，到了四十年後，還有很多未見實現。比方同文館之設立，是在一八六七年，廣方言館及譯書局是始於一八六七年，製造局始於一八六五年，派留學生赴德習陸軍赴英習駕駛製造，是在一八七六年，創設海軍設水師學堂，是在一八八〇年，武備學校是一八八四年纔有。此外又如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更四十年後的事。所以平情來說，太平天國滅後的曾國藩李鴻章薛福成郭嵩燾張之洞張百熙等，老實不過努力於容氏的計畫的部份罷了。

容氏上面所條陳於干王的七事，干王雖特別注意，然干王並非太平天國之主腦，並且他見得太平天國之領袖人物，多為無識者流，所以干王所給予的爵位，他也不受。然他自傳中說他曾告干王曰：無論何時，太平軍領袖諸君，苟決計實行這種計畫，則予必効力奔走。他所以不受爵位之原因，正像上面所說，不願徒享無功之賞。我們於此，可以明白容氏乃一位實事求是，不重虛名的人，並且他乃自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而非投機得利，阿媚求榮的人。後來有些人見得容氏在自傳中於曾國藩則尊崇備至，於他人則鄙視無餘，遂以為容氏之所以出此，乃由於國藩之對他力加提拔，殊不知容氏個人之特性，並非由於他人之提拔而譽人，我們試一看他之不受干王的爵位，以至他之鄙視總稅務司之為己加俸，以及不受孟松中學校董之傳道志願，就能知他的獨立不倚的特性。

他既捨去干王的盛意，他後來也不像薛福成們之因曾國藩之傳書求賢而入其幕府；反之一八六三年之見用於曾國藩，是從曾國藩之請求，並非由他的請求；我們可以說他之所以入曾氏幕府，並非曾氏之名重位尊，而乃求自己平生懷抱的實現。他自傳裡說：

「予當修業期內，（指在美國）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猶甚，每一念及，輒為之快快不樂；轉願不受此良好之教育為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智識愈高者痛苦益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智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智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雖然，持此觀念，以論人生之苦樂，則其所見亦甚卑，惟

怯懦者爲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偉大之事業，而趨於高尚之境域也。在子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何也？予既遠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學之志，雖未能事事如願以償，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資格，予固大可自命爲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爲已受教育之人，則當旦夕圖強，以冀平生所學，得以見諸實用；此種觀念，予無時不耿耿於心。蓋當第四學年中，尙未畢業時，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規畫大畧於胸中矣。予意以爲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爲標準，專心致志以爲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畢業之時，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願之成熟時也。」

從這段話裡，我們明白他覺得中國根本的需要是教育，而他所謂教育，又是西洋的教育。原來容氏自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是西洋的教育，而且因爲他自在澳門入校以後，他的環境是西洋文化之下的環境。他看看中國之所以腐敗到這個田地，完全是由於中國人的智識的低下，智識的低下，從個人的觀點看去，雖似減了不少的痛苦，然從國家的觀念看去，却是國家衰落滅亡的預兆。所以爲國家的前途計，他所亟亟然希望於心者，是「使後予之人，亦能享此同等的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富強文明之境。」

然而要想達到這種境地，則中國人要認認真真的澈底西化，而這種澈底西化的實現的初步是派送中國有志之士到西洋直接受西洋教育，像他自傳所說：「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爲少年新中國。」他不提倡在中國設一間中學或大學而請洋人來做教授，他也不提倡張之洞式的留歐不如留東的論調，

(這時的日本還是醉夢未醒，縱是醒了，容氏也不會做此論調。)因為這種的西化是間接的，是皮毛的。他相信一個人的觀念和人格的澈底變化，不但只靠着學校裡的書本和教師，而是大部分靠着他的環境。所以要澈底西化中國，則不能不先求澈底的西化的中國的國民，能夠有了一部分的澈底的西化的國民，則他們返國之後，自然而然會提倡新教育，新政治，新社會，以至新生活。所以派送學生到西洋留學，照他看起來，是澈底西化中國的首要條件，這種一刀見血的遠見，並非一般足跡未出國門一步的人所能想到，這樣的洞悉中國的根本需要，在當時除了遠涉重洋久住外邦的容氏，簡直是再找不到的。

這種的見解，本來是發生於一八五四年以前。在一八六〇年，他對王所條陳七事，而不明言及此者，大約是包含於第六條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之中；或者見得太平天國之命運尚在狂風暴雨之中，須候所陳各條實行之後，而後再談。過了三年之後，(一八六三)他被文正召見，據他自傳說：文正問他，「若以為今日欲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着手？」他心裡本想以教育計畫為答，但是事前友人已告訴他，文正此次之相招，乃欲建立機器廠。他既明白文正所見不過如此，同時又以自己之於文正本無舊交，提倡其所想像不及的計畫，似嫌冒昧，原來文正之欲建立機器廠，是鑒於西洋各國機器之精；而且太平天國之蕩平之賴於外國器機與人士之力者更非淺鮮，所以文正心目中之西洋優點，就是機器。文正未出國門一步，未諳西洋文字，其所認識的西洋文化的淺薄，是很當然的。然文正既有了振作的願望，那麼將來能夠幫助他的教育計畫的實現，乃意中事。

文正既屬意於機器廠，江南製造局遂於一八六五年成立。然製造局的規模的計畫，以及機器之在外洋訂辦購運，又賴於容氏的力。後來他從外國回來，文正很為嘉許，且奏請特授以候補同知。一八六七

年，因文正到滬參觀製造局之便，他又借機進言，於廠旁立了一所兵工學校，招選有志青年學子，授以機器工程上的理論和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械和外國工程師，這種計畫據他自己說，是他向來所懷的教育計畫的小試其鋒。

兵工學校既得文正的贊許，他又進而條陳四事；不辭繁瑣，我且把來抄錄於下：

「(一)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公司須為純粹之華股，不許外人為股東，即公司中經理職員，亦概用中國人。欲鞏固公司之地位，並謀其營業之發達，擬請政府每年撥款若干以津貼之。其款可由上海鎮江及其他各處運往北京之漕米項下，畧抽撥數成充之。漕運舊例，皆運米而不解銀，每年以平底船裝運，由運河駛赴北京，故運河中專為漕而設之船，不下數千艘。運河兩岸之居民，大半皆藉運漕為生，但因運法不善，遂至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紆緩，沿途侵蝕，不知凡幾。值天氣炎熱，且有生蛙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獨量數不足，米亦朽敗不可食。官廳旋亦知其弊，後乃有改用寧波船，由海運到天津，更由天津易平底船以運京。然寧波船之行駛亦甚緩，損失之數與用平底船等。愚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則平底船及寧波船皆可不用，將來漕米即逕以汽船裝運，不獨可免沿途之損失，即北方數百數萬人民仰漕米以為炊者，亦不致常食朽糧也。

(二)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試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為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年限定為十五年，學生年齡，得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為度。視第一

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着有成效，則以後永定爲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當別設留學監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項留學經費，可於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利。礦產既經開採，則必兼謀運輸之便利，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不可不築鐵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開採礦產，即間接以提倡鐵路事業也。

(四)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以防外力之侵入。蓋今日外人勢力之放恣，已漸有入中國越俎代謀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謬。彼天主教士在中國勢力已不僅限於宗教範圍，其對於奉教之中國人，幾有管轄全權。教徒遇有民刑訴訟事件，竟由教會自由裁判，不經中國法庭訊理；是我自有之主權已於法律上奪去一部分也；是實不正當手段，若不急謀防範，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故政府當設法禁止，以後無論何國教會，除關於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權以管理奉教之中國人。」

照他的意見，這條陳之第一三及四項，是假來做陪襯的。從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條陳是很平常的事，然在當時除了第四項外，其餘三項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去，無一不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容氏的注目點雖是第二項，然後來四五十年間，李鴻章張之洞之所謂洋務革新，均不外是鐵路採礦，而招商局之設立，却在同治十一年間。(一八七二)

容氏平生所懷抱的教育計畫，既爲這次條陳中的要旨，他從此以

後，沒有一天不致力於此條陳的上奏；是一八六七年由江蘇巡撫丁日昌代奏。然當時因相國文祥的丁憂，且不久自己逝世，這種計畫，遷延至一八七〇年天津仇教事起，始有機會，使之實現。容氏自傳中說：

「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無日不懸懸然不得要領。偶因公事謁丁撫，必強聒不已，并懇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辦事必俟機會，機會苟至，中流自在，否則枉費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時機者，要亦人力所造也。已而天津人民，忽有仇教舉動，慘殺多數法國男女僧侶，其結果使中國國家蒙極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結果，而引為實行教育計畫之機會，洵非予所思，然使予之教育計畫，果得實行，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是因仇教之惡果，而轉得維新之善因，在中國國家未始非塞翁失馬，因禍得福也。」

仇教案發生後，政府因派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及劉姓一位為調停大臣，容氏也得丁氏之招為譯員；於是容乃乘間進言於丁，結果是四位調停大臣，聯銜入奏，而一八七〇年冬，奉硃批着照所請，而成為他所認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的新紀元。他二十年來的懷抱，和十年來的奔走疾呼，終於一八七二年實現，而百餘留美學生，也從此以後一批一批的由容氏護送留美！

文正死後，文忠（李鴻章）用事，不久陳蘭彬被委為駐美公使，有吳子登者得蘭彬的推薦，被任為留學監督。這兩位都是守舊人物，對於留學之舉，沒有同情，弄到後來所有留美百餘學生，被召返國，關於陳吳的觀察，容氏有下面數段話：

「吳子登本為反對黨之一派，其視中國學生之留學外洋，素目

爲離經叛道之舉。又因前與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於曾丁二公所創之事業，尤思破壞，不遺餘力。……然則陳之荐吳繼區(岳良)可知陳亦極頑固之舊學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學爲然矣。陳之此舉，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對黨地位，擅拳擲袖，準備破壞新政，以阻中國前途之進步，甚矣，知人之難也。陳既挾此成見，故當任監督時，(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與予共事，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爲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爲反對以阻撓之。例如學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雜各費，又如寄居美人寓中，隨美人而同爲祈禱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禮，以及平日之遊戲運動，改裝問題，凡此瑣瑣小事，隨時發生。每值解決此等問題時，陳與學生常生衝突，予恆居間爲調停人，但遇學生爲正當之請求，而陳故靳不允，則予每代學生畧爲辯護，以是陳疑予爲編袒學生，不無怏怏，雖未至形於詞色，而芥蒂之見，固所不免。蓋陳之爲人，當未至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故於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據爲標準者，仍完全爲中國人之見解；卽其畢生所見所聞，亦以之處專制壓力之下，習於服從性質，故絕無自由之精神，與活潑之思想。而此多數青年之學生，既到新英國省，日受新英國教育之淘鎔，且習與美人交際，故其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其一切言行舉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其故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但在陳蘭彬輩眼光觀之，則又目爲不正當矣。……推彼意想，必以爲其一己所受純潔無瑕之中國教育，自經來美與外國教育接觸，亦幾爲其所污染，蓋陳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實存一極端鄙夷之思也。

這種守舊和頑固人物，是百餘留美學生之被召返國的主動人。除

此以外，尚有一種副因，爲容氏所初料不及者，就是留學事務留的建築。建築的目的，本爲永久辦公的地方，但是學生教員（漢文）和監督大家同在這裡居住，結果是好像一個中國城，China Town 而失了赴外國要留心於外國人的生活風俗習慣的宗旨；而且這般頭腦頑固的漢文教員及學生，大家朝夕相晤，衝突愈多，這一點的錯誤，容氏自己傳裡也承認。

全數學生的召回，是一八八一年，本來他們第一批赴美是一八七二年，算起來也有十年左右，但是大數赴美時，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預備。結果是到美數年，未必多見效益，然若說對於中國完全沒有用處，却也不是正確之言。容氏曾說：

「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頭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爲不容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今此百十名學生，強半列身顯要，名重一時，而今日政府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學事務所之非計，此則余所用以自慰者。自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國學生陸續至美留學者，已達數百人，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雖經蹂躪，不啻閱二十五年而枯株復生也。」

事實上我們再一看一九〇二年以後，政府之派留學生赴歐美，以及清華學校之設立，就能知道容先生的見識的深遠。此外一九〇一年之改書院爲學堂，一九〇二年之廢八股，一九〇五年之廢科舉，民國元年之成立教育部，改學制的教育上的種種設施，也不外是實現容氏一八六〇年前的理想罷。

凡是相信教育是改造社會與變換文化的工具的人，總當敬服這位

努力提倡的先鋒，凡是相信中國是要西洋化而且是要澈底的西洋化的人，總不要忘記這位努力提倡的先鋒，其實他自己就是這種信仰與這種努力的先鋒。我們現在乘着舒服美麗的頭等船位赴歐美，還說是遠涉重洋，我們想起要乘一百五十日的一葉帆船而赴美求學的容先生，要作何種感想！

在教育的西洋化上容先生的功勞固如上面所說，在機器廠兵工學校的成立上，容先生又是唯一的負責創辦人。此外招商商局的成立，上面也已說過，是依仿他一八六七年所條陳四事之第一項。到了中日戰後，容氏因見中國之慘敗，曾對着張之洞條陳過一個很新鮮和激烈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政府須聘請外人四人以上，以為外交財政海軍陸軍四部的顧問；並且和他們訂十年合同，若有成效，則繼續聘請。此外又派青年有學的國人，處於各顧問之下，以資練習，使中國的行政機關，逐漸西化。張之洞對於這種計畫，默無一言，結果是曇花一現。然我們覺得後來政府之請外人顧問者，指不勝屈，可見容氏之所謂在當時為激烈新奇的政策，終有施行之一日。

此外又像一八九六年，他所條陳的中央國立銀行，得了張蔭桓翁同龢的代奏，幾經就緒，他且被戶部的委任，將赴美國，和美國財政部商酌此事。然而後來又為貪官污吏所破壞，而成畫餅。銀行計畫既失敗，他又擬向政府請求一築造鐵路の特權，後來也因別種阻礙而難成。然而這些計畫，總有後來者為之籌畫實現，那麼容氏的計畫，並非空中的樓閣可比呵。

到了戊戌變政(一八九八)容氏希望政府努力改革，曾留京師以觀其究竟，而且他既同情於維新事業，據他說，他的寓所，一時幾變為新黨領袖的會計場。到了捕索黨人的事件發了，他也徙逃上海。而當時在上海的有志之士所創設的強學會，他是被選為第一任會長。他晚

年再回美國，然他對於革命事業的贊助，也很不少。所以一九一二年他死時，在上海爲他而開追悼會，人們叫他做革命的先進者。

容氏生平久留外國，中文雖未臻深造，然返國時，克苦用功，亦能運用自如。一九六五年，他從美國購辦機器返後，任事於丁日昌幕府，公餘之暇，曾從事翻譯，Colton的地理學Geography是他譯的。他又有志介紹些法律書籍於國人，惟因當時友人的勸阻，以及他種的阻礙，終於未成。但是我們對於他這種的懷抱志向，是不能不佩服的。

總而言之容氏不但在教育的澈底西化上是一個先鋒，他在西化的其他方面，也是一個先鋒。六十年前人們所給與曾國藩的機器文化的提倡的盛譽，是由他歷途萬程，爲時經年，備歷艱辛，不負委託（文正奏語）而成立的；五十年前的招商汽船公司，水師學堂，武備學校，是他七十年前所提倡的；四十年前的所謂李鴻章的鐵路礦務，是他六十年前所提倡的；三十年前的康梁維新運動，二十年前的革命運動，是他所贊助的。這些的運動的計畫和見解，是八十年前的容氏所已見到的，可惜八十年來的變化改革，還做不到他八十年前所畫的圈子。

我想七十年以來能夠主張澈底西化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要找一位像容先一樣的自始至終的主張澈底西化，恐怕簡直是沒有的了。